

# 智能充电桩为绿色出行“加油”

如今，在中国不少城市的停车场和购物中心，新能源车的司机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通过手机定位找到智能充电桩，为自己的绿色出行“加油”。

## 人机互动使用方便

据了解，目前新能源车司机通常会下载相关移动客户端。这些客户端通常拥有卫星定位、导航、预约、缴费等多重功能，以便车主在汽车电量不足时能够及时找到最近的可用电源。

与此同时，充电桩本身智能化水平也较高，使用起来十分便捷。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智能充电桩看到，充电桩正中显著位置是一块人机互动触屏。使用时，用户可以选择刷卡或扫二维码的方式进入操作界面，同时将充电桩接入车身，再从“定时充电、定量充

电、定额充电、自动充电”等多种模式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加油”方式即可。

目前，北京市共建设了8万根充电桩，车桩比居全国第一。在充电桩迅速增多的背后，则是新能源车的蓬勃发展以及绿色出行理念的不断流行。

## 各大城市竞相布局

事实上，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智能充电桩建设方面下足了功夫。

目前，天津市的充电桩覆盖了公交、高速公路、城市公用、政府机关等范围，中心城区实现了新能源汽车5公里充电服务半径网络。“截至2017年3月，天津节省燃油1.3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1万吨。”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在浙江，平均每三辆电动汽车就有

一个充电桩。同时，浙江还建成了智能服务平台，实现了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在四川成都，政府规划提出，2020年前成都市将共建设约8.8万个自用充电桩，同时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原则上应100%配建或预留充电桩位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忠指出，智能充电桩现阶段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新能源车日益增长的充电续航要求。因此，各地政府积极扶持充电桩建设无疑十分必要，这也是鼓励绿色出行、促进交通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

## 运营模式仍需规范

“目前，城市是新能源车发展的主战场。但很多大城市老旧小区较多，这



就涉及一个各方协调利益、凝聚共识的过程。”张文忠说，一方面，智能充电桩是促进新能源车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很多老旧小区公共空间较小，业主出行方式也不一致，物业管理确实有一定难度。因此，地方政府、充电桩企业、社区组织、业主代表等各方都应该在此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协商，确保充电桩安全有序运营，帮助更多人实现绿色出行。

中国日报网 2017.6.8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科技巨头们正争相研发面部识别技术，并积极推动其投入商业用途。与西方竞争对手对待面部识别技术的谨慎，担心吓到有隐私意识的机警消费者相比，这些中国公司显然更加大胆。

## 科技巨头竞技面部识别 民众每天扫脸成常态

虽然在某些地区，隐私担忧已经促使面部识别技术的进展放缓。但在中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每天扫描面部。从付款到访问居民区、学生宿舍、酒店宾馆等，很多时候都需要进行面部扫描。这项技术甚至被用来解决数十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北京天坛厕纸经常失窃问题。这些公共厕所如今安装了自动出纸机，它们可识别用户面部，从而阻止频繁进入者。

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旗下在线支付服务蚂蚁金服开通了新的功能，其4.5亿用户可通过自拍登陆在线钱包。专车应用滴滴出行也正利用面部识别技术验证司机身份，百度已经开发出需要面部识别才能进入的门。

虽然中国面部识别技术背后的基础性人工智能研究与欧美处于类似水平，但中国在商业应用中已经取得领先优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体识别技术专家冷彪（音译）说：“谷歌并未全力追求面部识别技术，因为它有更高的长期愿望，实际上其面部识别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中国大公司更加关注短期收益，它们视面部识别技术为利用AI取得先手的最快、最好方式。”中国庞大的人口与宽松的隐私法相结合，促使获取信息宝藏的成本超低。

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公司在推出面部识别技术方面显得更加大胆。此外，面部识别技术还可能被滥用，用户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被检测。以提醒警方注意那些被禁止旅行的乘客。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身份证明照片数据库，里面拥有超过10亿人的照片，而美国仅为4亿人。此外，中国民众已经习惯将身份证插入芯片阅读器中，以便设置手机号码、购买车票以及入住旅馆等。中国也是世界上首个在身份证件中植入射频身份识别技术的国家。

网易科技 2017.6.8 文/小小

# 科学家该不该开公司

不久前笔者在调查采访时发现，对于科研人员该不该开公司、转化技术成果，意见分歧较大，正反双方往往各执一词。

反对者认为，科研人员长期待在实验室，不了解市场、不会经营，自己开公司势必处处碰壁，还会荒废科研事业、耽误学生培养。一位企业家举例说，有位教授拿了省级科技奖之后，坚持自己开公司，由于不懂商业那一套，没几年就失败了。

支持者则认为，科研人员攥着着实打实的技术成果，自己开公司能够迅速提升产业竞争力，比一些只会“山寨”的所谓创业者强多了。他们指出，坐拥丰富的科技资源，加上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科研人员不必受制于人，应该直接把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

仔细想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现实中也都有相应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不可否认，就社会分工而言，科研人员和创业者往往是两类人，两者各有专攻，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角色切换可能有难度。正因如此，许多人把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视为成果转化的正途。

但相比合作创业，独立创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不仅能加快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成功率，而且能带给科研人员更丰厚的回报，进而更大程度地激发和调动其创新积极性。

科研人员一旦有了独立创业的念头，必须要客观冷静地评估技术价值，更加重视市场、销售和团队合作。这就需要科研人员不断学习商业知识和经营

本领，实现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

创新创业一肩挑，还需要社会上的专业机构施以援手。国外有这种方式，当科研人员拥有核心技术后，会找投资人、成立公司，再找“工程师”团队帮助他们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我们不妨借鉴这种“工程师”团队的模式。

此外，国家也应进一步细化有关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相关政策，完善投融资机制和相关评价体系、知识产权保护，让科研人员尽可能少些后顾之忧，多些干劲冲劲。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也应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最好去做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想创业、潜心学术的科研人员，国家应建立合理的薪酬分配体系，确保他们获得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有了足够的尊严和体面，他们才能不为身边的名利所惑，潜心前行。

《人民日报》 2017.6.9 文/刘诗瑶

# 建设“健康城市”有什么新逻辑？

## （上接第一版）

据世界卫生组织：到2025年，70%的中国人口（约9亿人）将生活在城镇中。传统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健康问题，如：饮用水安全和卫生设施建设、精神卫生等还未根本解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又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人口老龄化、交通拥堵、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加剧等等。

我国处在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城市化过程对于实现新型城市化和健康城市化至关重要。关于“绿色”和“可持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则提出，近年来，国际趋势已从唯物的“绿色”，走向人的健康，譬如全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谓的“绿色建筑标准”，跟节能、减排有关，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物质来转的。但是它缺少一个核心指标，即“人在这里边待在里面究竟舒服不舒服”？其实这才是未来“绿色”化最根本的东西。

“一个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不可能是健康的城市，一个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是充满风险的城市。”何艳玲的演讲聚焦复杂社会中的城市治理问题，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建构性风险。认为土地金融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超乎寻常的城市化红利……处于构建性风险中的“风险城市”能否转化为健康城市乃至美好城市的关键，“在于面对土地，我们谁来决定谁将得到其收益，并将收益用来干什么，即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城市公共决策过程，或者如何在城市公共决策中呈现大多数城市居住者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我们前赴后继地离开农村，却又满

怀惆怅地想念乡村。乡愁，实质是我们对空间和人之间关系舒适、亲近、温暖的想象。”私下里，何艳玲偏爱这段现场发挥写出的文字。

她说，以往城市发展在这三方面做的并不完善。就舒适而言，步行可达空间的舒适、公交地铁中的舒适……每个人生活在城市中都会有非常深刻的身体体验，都会有相对一致的需求。但是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的调配之下，其实我们都慢慢迷失了。当每个人都迷失一点点，在决策的时候、在做规划的时候、在做工程的时候……也就忽略了将个体体验放入这个过程当中，从而忽略了我们的切身体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需要交往，城市需要最低程度的秩序，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可以生活的空间，安然相处……

## 创新公共决策，构建健康城市

“必须要注意到增长仍然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而城市作为一个最好的增长容器，将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功能定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很多对城市其他层面的想象，必须要和这个增长容器相互的并存”。何艳玲说，增长的启动核心有三个：经济体制改革、放权让利和政府经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着绝对性作用。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而且仍然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乡村大榕树下的邻里相聚，或者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空间的一种期待。这样的想象，不是到农村去寻找，而是需要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中建构。“我们的发展创造了很多奇迹，但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服务的缺失、社会分化，社会空间被更

多地用来作为净增长的容器，而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交往、闲暇消费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托的容器。”何艳玲的理论阐述非常简洁，但实际上都有很多复杂的、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作为支撑。

她认为，在城市里消弭乡愁，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自己，譬如规划师可以通过做规划，研究者可以有理论研究的方式，政府官员有公权，哪怕是城市清洁工，每个人在城市链条里都是一个环节，美好城市的实现，其实需要各个环节尽职尽责。

她提出，城市发展的新逻辑、新价值和政府的新角色，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其核心是理解和承认人的多重性，并将其带入到城市公共决策过程、城市管理过程和城市技术过程中。

“所谓人的公共属性是指，第一，人作为人口而存在，即人口是消耗资源的，是一种负担；第二，人作为一种劳动力而存在，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第三，人本身就是资本，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容器；第四，人是交往和情感的共同体。而这些属性都必须要经过更均衡的设计进入到我们城市所有的过程。”

“我认为政府的角色也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何艳玲认为，城市向健康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也需要转型。第一，政府将作为一个社会的投资者而出现，为不同人群提供匹配、有效、良好的公共服务；第二，政府将作为一个秩序的投资者，为不同行动主体提供规则，并且约束它来遵守；第三，政府将作为价值投资者，为不同城市居住者促成城市认同。在城市的伙伴关系当中政府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环。